

殖民主义与 中国近代社会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主编：孙立新 吕一旭

ZHIMIN YU
ZHONGGUO JUNDAI SHENHUI
GUODI XUESHI HUIJI
LUNWENJI



人民出版社

殖民主义与 中国近代社会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主编：孙立新 吕一旭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王 萍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孙立新
吕一旭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 - 7 - 01 - 008398 - 8

I. 殖… II. ①孙…②吕… III. ①殖民主义-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D066 - 53 K25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609 号

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

ZHIMINZHUYI YU ZHONGGUO JINDAI SHEHUI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孙立新 吕一旭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8398 - 8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序 言.....	[澳] 大卫·古德曼	1
引 言.....	[澳] 吕一旭 孙立新	3
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	[英] 毕可思	8
19~20世纪的来华法国医生：南方开放港口、租界和租借地 的拒绝或依从.....	[法] F. 布莱特-埃斯塔波勒	44
想象的空间：1901~1947年及以后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重现 和镜像	[意] 马利楚	73
家信与中国：1913~1914年伊莉莎白·弗雷在天津.....	[澳] 吕一旭 [澳] 大卫·古德曼	128
1941~1966年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	[美] 杜赞奇	159
“同乡”背后的权力与声音：周生有事件再探	冯筱才	183

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问题	[美] 顾德曼	212
上海租界公墓研究 (1844 ~ 1949) [法] 安克强	252	
一位细菌学家和共产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社会——国崎定洞 在青岛 [日] 饭岛涉	298	
近代殖民司法侵略的标志——青岛监狱 张树枫	315	
德占时期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 孙立新	345	
试析德占胶澳的称谓与地位 朱建君	366	
超越民族：殖民主义与青岛的抵抗 (1897 ~ 1914) [德] 余凯思	388	
附录	426	

序 言

中国区域研究项目（The Provincial China Project）开始于 1994 年，其宗旨是：把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对中国经历的过度普遍化的迷恋转移到对中国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发展和行为的理解上来。它的主要关注点不再是首都和政策发展，而是在中国各地方层面实际发生的事情。

中国区域研究项目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其参加者有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学者，而且每年的研讨会都将最好的会议论文编辑成为论文集出版。1990 年代后期，中国区域研究项目开始出版号称《中国区域（Provincial China）》的定期刊物。现在，该期刊已改为电子杂志，由悉尼科技大学电子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着眼于中国各行省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针对某个专门的省级管辖区域的发展，它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而在最近几年，通过在历届研讨会上出现的大量与各行省和地方相关的个案研究，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着重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问题。

2007 年，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第一次涉及到历史问题。与以往仅仅关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做法不同，它也开始研究产生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领土上的殖民主义经历了。由中国海洋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人员举办的研讨会是极其成功和令人振奋的。针对中国的殖民经历，来自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思想交流。

本论文集展现了此次研讨会的成果。正如读者所能看到的，这

些成果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殖民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对中国人和殖民主义者双方复杂多样的影响。我衷心感谢所有参与研讨会的组织和论文集的出版的人员。我特别感谢孙立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和朱建君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在青岛所做的工作；我也特别感谢顾德曼（Bryna Goodman）教授（俄勒冈州大学）和吕一旭博士（悉尼大学）提出的学术鉴定意见。他们都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

悉尼大学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
2009年3月

引言

本书所收录的 13 篇论文选自 2007 年 9 月在青岛召开的“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Colonialisms and Chinese Localities）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由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举办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中国等众多国家，其中既有享誉世界的专家也有正在攻读博士的青年学者。正如会议代表丰富多姿的不同背景，会议论文在“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主题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探讨了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后期香港、澳门回归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与西方列强的遭遇。

丰富多姿、百家争鸣是这次会议的特点和强点，但却给编辑论文的人出了难题。应该怎样排列这些论文？怎样归类整理？每一篇入选的论文自身都是一个世界，都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或项目，凸现出不同的流派和治学方式。“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主题，会议论文的多样性与不同性正是这一复杂主题的体现。梳理归类是史学家的天性，直面复杂更是当代史学治学的根本。编者最后选定以“空间”（space）为经串联入选论文。

在此，“空间”首先被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或“地区”。从华南农村到天津，从澳门到上海，从香港到青岛，学者们追踪着殖民主义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不同活动及中国社会不同群体对此的反应和应对。其次，是当代史学对传统“空间”定义的扩伸。“空间”一词已从本体论的概念延伸为知识论的概念。“空间”是文化习俗、政治统治和集体记忆互动的产物，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本书所收录的论文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殖民空间”（colonial

space) 和“交往区”(contact zone)，从民国海关的航标灯塔到上海的华人股票市场，从德占青岛的华人监狱到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充分显示出殖民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英国学者毕可思 (Robert Bickers) 的论文《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将我们带回 1932 年汕头外海一个名叫石碑山的航标灯塔，再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小故事，即灯塔管理员奕伟士 (Charles Hugh Edwards) 和逐侠诺 (Alexander Nickolaevitch Andreyanov) 被游击队抓走后悄然死亡一事。论文以这件逸事入手，描述了把这两个外国人安排到石碑山灯塔的体制和社会，揭示了发生在灯塔内部及其周围的种族和阶级冲突，使我们注意到 30 年代仍然在中国存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殖民主义世界的影响及其复杂性。正如论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透过这一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学会放弃“那些简易的、二元论的定性分析条约口岸世界的做法，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直接考察其时态、相互联结和把武宁村、石碑山灯塔站、厦门、上海及其他更远的地方紧紧地网连起来的方式，对它们作出分析并加以理解”，使我们对在中国近现代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多样性有更好的理解。

法国学者布莱特 - 埃斯塔波勒 (R. Bretelle - Establet) 的论文《19 ~ 20 世纪的来华法国医生：南方开放港口、租界和租借地的拒绝或依从》从宏观的角度概述了处于法国势力影响范围内的中国南方居民对法国医生及其治疗方法的态度。作者借助于法国档案、地方志和中国医学文本，揭示出隐藏在中国民众对西医态度后面的权力问题。正如作者所述：“帝国以及后来的共和国的政治自主权无疑限制了法国医生的权力，但也有助于减少民众抵制外国医治者及其医疗方法的现象。法国医生对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不得不采取更加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强迫他们来接受。”

意大利学者马利楚 (Maurizio Marinelli) 着重解读天津意大利租界于 1901 ~ 1947 年之间在各种媒体里的重现并探讨这些重现中隐匿的有关意大利租界问题之中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或文化方面的历

史原因。论文运用福柯提出的“镜像”与“另类空间”概念，比较和对照对前意大利租界的不同重现以揭示塑造殖民地知识生产的不同方式和从后殖民主义中派生出来的话语。

澳大利亚学者吕一旭和吉德曼的论文以文本学的方式分析著名德国建筑师赖义的妹妹伊莉莎白 1913 ~ 1914 年从天津寄回德国的家信。这些信件不仅记述了一位德国年轻女性 20 世纪初在中国的殖民经历，而且详细地说明了“殖民凝视”。然而，家庭成员的日记、信件并非仅是能让人生动地洞悉日常殖民经历的有用信息源，写作者的目的性可以清楚地影响这类文字资料的真实性。

著名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论文《1941 ~ 1966 年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形式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怎样使香港社会变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经济的飞速发达并没有完全改变香港殖民社会的实质，论文从宏观上揭示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和不同性。

十里洋场的上海既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象征又是中国与西方现代化交轨的场地，从各种角度探讨近代上海社会在多种权力机构、经济势力、文化碰撞的特殊历史是这次会议的重点。上海学者冯筱才重构发生在 1904 ~ 1905 年的周生有事件，以“同乡抗议”问题为线索，探讨这一清末重要的外交及舆论事件背后的权力声音。作者通过详细的原始资料分析指出，周生有案不是一次重要的民众集体抗议行动：“所谓‘同乡公愤’，与其说是实际的群众情绪，不如说是上海道台与报馆主笔在文字中有意塑造出来的一种集体形象。”建构“同乡”话语实质上是为权力和政治服务的。

美国学者顾德曼以上海 20 年代初华人股票市场的迅速兴起及崩溃为例探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问题。论文指出，仅参照经济学常规来解释上海交易所的运作并将其视为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是不够的。上海作为中西“交往区”的特殊地域性——半殖民地提供的多重模式的方式、相互限制的殖民权威，政治及民族主义话语等都是催生并推动 1920 ~ 1921 年上海股

票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论文通过对那些导致众多上海股票交易所建立的事件和关键人物以及由这一新经济形式演生的意识形态的概括介绍揭示了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经历的多重不平等权力机构和思想文化的作用，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制造忧患意识的方式。作者指出：“正是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导向的历史编纂的极端化词语模糊了人们对复杂的身份认同、混合的机构和遍布全城的跨国资金流动及其关系网的认识。”

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着眼点也是作为中西“交住区”的上海，但却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上海租界公墓。论文概述了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上海租界公墓的发展、管理及变迁，重点探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国租界公董局如何制定死亡人口政策，如何利用各种特权确定安葬死者的场所以及如何应付城市变迁及人口增长。论文不仅提供了上海近代社会一段特殊的历史，并从这一特殊的角度揭示出殖民主义在上海的运作情况。正如作者所指出，上海的繁荣下掩盖着各种矛盾，死亡也不例外：“城市空间被切成碎片，社会景观也被分割开来。国别不同，人享受到的权利就不同，不管是死亡还是活着。”

毫无疑问，与作为中西“交住区”的上海一样，德国占领下的青岛是研究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专门探讨德占青岛。日本学者饭岛涉着重讨论细菌学家和共产主义者国崎定洞（1894～1937）眼中的青岛社会状况。青岛学者张树枫提供了青岛监狱从被德国殖民者建立到共和国时期的全方位历史。孙立新教授的论文详细追踪德占时期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朱建君从分析青岛在被占期间得到的多种不同称谓，例如“胶州殖民地”、“胶澳租界”、“胶澳租借地”等入手，揭示出隐藏在这些称谓变化后的历史环境变迁和利益博弈，证明了“今天意义上的胶澳租借地称谓的出现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变化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学者余凯思（Klaus Mühlhahn）对青岛社

会不同群体在殖民地中的矛盾与互动的分析可被视为这次会议的总结。在详细分析了殖民当局在青岛实施的各种统治策略和规章后，作者又详细探讨了生活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这些统治手段和话语。作者认为，青岛殖民社会的生活是复杂多样的，简单地运用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和被殖民者的反抗与屈服这样的二元论，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用作者的话来说：“殖民统治并未存在于一个密封的独立王国之中，通过被殖民者的参与，它受到了重新评价和改变。”青岛殖民社会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史学对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已彻底摒弃了简单化的政治与道德评价和二元论。线性的宏观叙事逐渐让位于以空间思维为主导的微观研究。研究者日益注意到被殖民者在殖民主义中的不同参与和应对形式。特别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在与殖民社会的相互纠缠与作用（特别参见顾德曼、冯筱才、余凯思的论文），借余凯思的话来说：“青岛的例子已经显示出，在殖民背景下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的呈现出的特殊形式，不仅仅源于传统，至少也部分地是殖民背景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纠缠的结果。因此，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改变和变化，不仅是——正如我们为熟知的一些画面所提示的那样——内部的、历时的现代化的结果，而且也同样是多重共时进程的结果。”这一结论不仅对于研究殖民主义史蔚为重要，而且对于研究一般历史也极富启发意义。

吕一旭（悉尼大学）
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

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

[英] 毕可思

孙立新、石运瑞译，张志云校

前人足迹有时很难追查，有关下面将要讲述的一些情事——它们耗费了当地和国际上许多行为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以及至少两个人的生命——的记录仅仅简单地提到，1932年2月28日游击队占领了汕头附近的石碑山灯塔（Breaker Point lighthouse），撤退时，他们“带走了”一个灯塔管理员（俄国人）和一个仆人，留下了一封写给英帝国主义和香港总督的信。故事由此就产生了。乍看之下这只是一个不会产生确定后果和没有什么力量的政治姿态。^①“英帝国主义者”对留有签字的宣言或者其暂时占领一个中国灯塔行为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灯塔距离英帝国最近的正式前哨香港100多英里，而中国海关——其海务处（Marine Department）管理着中国航标灯系统——属于中国国家的一个代理机构，它向民国政府财政部报告了此事。没有人去关心一个俄国人。1999年开始编纂的《惠来县志》谈论了一些灯塔情况——直到2002年该灯塔仍是亚洲最高的灯塔之

^① 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Breaker Point的中国名称被写作石碑山灯塔，亦称赤澳灯塔。

——但没有提及这个事件，尽管它钜细靡遗记录了同年被“保安”队（*Pacification forces*）杀死的革命烈士的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①他们中的一些是在搜寻俘虏过程中被杀的。《汕头海关志》附加地提到有一个英国人也被带走了。此人的确是个英国人，尽管他的英国人身份很勉强。^②他的名字叫奕伟士（Charles Hugh Edwards），是一个条约口岸欧亚混血者，他的混血儿身份道尽这件被遗忘的事件中官方诡异的处理方式。它发生在远离条约口岸中心的地方，其主角的血统和职业使他远离英国或国际性的中国人世界。然而，透视奕伟士和逐侠诺（Alexander Nickolaevitch Andreyanov）的悄然死亡可以提供一个说明 1932 年 2 月 28 日把他们安排到石碑山灯塔的体制和社会的机会。

就 1932 年的标准来看，灯塔管理员被抓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会引起多大注意的绑架事件，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揭示发生在灯塔内部及其周围的种族、阶级和民族冲突的机会。这些灯塔是中国海关在 1870 ~ 1940 年代建立的，它们遍布从广西到辽宁的沿海地区。技术的现代性与灯塔职员及他们的邻居在灯塔阴影里进行的人类卑劣勾当形成了鲜明对照。理解这个世界也许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在中国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殖民主义世界的影响和特征，以及由它们所造成的难题。在对实际存在过的殖民主义有长达数十年的忽视（在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是支持者的描述还是反对者的描述，帝国主义都受到了偏袒，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研究这个主题，对外国强权的问题和进程——它的实践、文化输入、占有、适应——进行“精确的”（就像柯文在 1984 年对学术界的嘱咐）探究。^③在完全中国中心的年代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① 惠来县地方志办公室：《惠来县志》，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797 ~ 806 页。

② 汕头海关编志组：《汕头海关志》，第 27 页。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编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第 147 页。

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断了与那些论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文献的联系，而这些文献或许能为理解中国近代经历的特殊方面提供更扎实的基础。他们也开始讲不同的语言（在此，人们立即就会想起“非正式的帝国” [informal empire] 和“半殖民主义” [semi-colonialism] 等概念），尽管也努力消除愈益增大的缝隙。^①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我们对中国条约口岸中外相互作用的这项传统学术研究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对殖民地、租借地、特许权、新拓居地（settlements）、自愿开放的市场等有了日益深入的认识，它们都是中国国家为控制外来国家或外来民族而设立或放弃的，尽管我们事实上仍对它们当中的许多东西缺乏适当研究。^②例如仍然没有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条约口岸的报纸、在中国的法帝国分区（French empire in China）等进行过研究，但新工作毕竟还是做了一些，比如对海关、美国的对华法庭（US Court for China）、伪满洲国、日本的领事体系等的研究，它们正在提供一个全面的角度。我们同样得到了新的、专门探讨传教士的

^① 贺远刚：《20世纪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和非正式帝国：一个分析框架》，载沃尔夫冈·莫姆森和贺远刚主编：《帝国主义及其以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伦敦：艾伦和益文出版社1986年版（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Mommsen &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第290~314页。

^② 在此，法国的广州湾租借地领域映入了我们的脑海。为了什么？那儿发生了什么？

遭遇和相互作用的学术著作。^①

但是对这个相互联结的世界的基础结构我们仍然没有太多了解，如同我们经常迈行的学术研究，聚焦于特别的场所和城市。^②航标灯是海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活动（这些活动部分地属于国家性质，比如安排人员到中国常设的客货流动关口工作）的一部分，有些基础

① 择其要者：关于海关问题请参见我本人新近的著作，文章被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编辑到《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545~736页，和他正在编辑的把海关视作中国的一个全球化机构的论文集；毕可思和安克强主编：《新边疆：在东亚的帝国主义新共同体，1842~1953》，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obert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 (eds), *New Frontiers: 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 ~ 195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芭芭拉·J·布鲁克斯：《日本的帝国外交：领事、条约口岸和1895~1938年的中国战争》，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Barbara J. Brooks. *Japan's Imperial Diplomacy: Consuls, Treaty Ports, and War in China 1895 ~ 193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伊莱恩·斯库丽：《与遥远国家的交涉：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美国公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Elaine Scully, *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杜赞奇：《主权国家和真实性：伪满洲国和近现代的东亚》，兰哈姆：罗曼和里特费尔德出版社2003年版（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罗芸：《卫生学的现代性——卫生和疾病在中国条约口岸的含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关于传教士和基督徒参见亨利埃塔·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正在进行的工作。好的研究包括唐日安：《福州的新教徒和1857~1927年近代中国的形成》，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 ~ 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李榭熙：《圣经和枪：华南的基督教，1860~1900》，纽约和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3年版（Joseph Tse - Hei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 ~ 1900*.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较早的有简·亨特：《绅士们的福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美国妇女传教士》，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Jane Hunter's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 of - the -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2002年耶鲁大学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罗安妮（Annie Reinhardt）著《在中国的航运帝国主义：汽船、半殖民地和民族，1860~1937》（*Navigating Imperialism in China: Steamship, Semi - colony, and Nation, 1860 ~ 1937*），是一个很好的矫正。

设施建于中国沿海及其主要河流上，并与全球国际中首先倡议的项目连接起来（例如水文工作），但是这些项目被设置在外围社区旁，或是邻近这些外围社区，而其职员都非常特异或是由这些职员的家人——更加特异——所充任。在《帝国塑造了我》一书中，我探讨了上海中下层英国人的招摇撞骗行为。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同类复杂面目的另一面则可以在航标灯和 1932 年的石碑山灯塔中发现。本文首先要概述一下航标灯服务的发展情况，然后再讨论由灯塔人员配置问题所引起的一些争议，最后则通过 1932 年的事件进一步说明这些争议。石碑山不是一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象征性标志姿态的场所，但却是一幕位于更为复杂的、并且可能是相当肮脏的秘密戏剧之中的公共场景。而且，它与支撑和规定条约口岸世界的结构和进程有着精确的联系。

一、灯塔体系

由海关发展的灯塔系统就足以写一份报告。^①要谨记的背景重点是，从 1860 年代起出现的一股科技动力打开了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航路。制灯工艺的技术进步（菲涅尔透镜）、蒸汽船的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电报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的扩张和影响，在 1860 年以后的 50 年里扩展了航标灯服务系统。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海岸、东

^① 我实际上有一份草稿，临时命名为《照亮中国沿海》，它相当深入且从比较的角度揭示了内容广泛的航标灯规划及其运作情况。主要的出版资料源是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关于中国海关航标灯服务的图解》，上海稽查总局统计处 1932 年版 (T. Roger Banister, *The Coastwise Lights of Chin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Lights Servic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932)。